

学术专论

清代永远枷号刑考论^{*}

陈兆肆

【摘要】明清是中国刑制史上又一转捩期，因应社会矛盾的丛集和加剧，是时刑制再呈“烦苛”趋向，而永远枷号等众多“无期”刑的出现和定制，即其显证。本文拟就始创于明初而定制于清代的永远枷号刑，于其立法、适用类型及其产生的内在理路作一考察，并藉以探讨清朝乾嘉时期中国传统刑罚的“自发转型”问题。

【关键词】清代 永远枷号刑 无限期刑 自发转型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2)-04-0015-13

Examination of the Punishment of “Pillorying Perpetually” in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was an another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with the propag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 the punishments once again became of diverse and severe. As an obvious case in point, numerous indefinite punishments including pillorying perpetually were institutionalized during this tim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ermination of the punishment of “pillorying perpetually”, and its codifica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address its legislation, the types of crimes punished,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practice, and the spontaneous transi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unishme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考诸中国刑制史，“永远”二字实具独特之意义。就明清而言，死刑之下，笞杖徒流等刑承沿前制而为正刑，而明代充军与清代发遣则系富有王朝特色之闰刑。凡此量刑，或以板数之多寡，或以道里之远近，或以年岁之长短，但均有明确而有限度的量化标准，以规定诸刑之等差。然而，作为中国刑制史上又一转捩点的明清两朝，因应社会矛盾的丛集和加剧，一反汉唐以来形成的刑罚“清约”格局，而再次呈现出“烦苛”趋向，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无期徒刑，突出如永远枷号、终身充军（止及本人）、永远充军（累及子孙）^①、永远锁带（铁杆、石礅）^②、永远监禁^③等刑，由“律外之刑”而“著为常法”，即其明证。

本文拟以律例、实录为主，旁及档案、文集等相关典籍，就始创于明初而定制于清代的永远枷号刑，对其立法、适用类型及其产生的内在理路作一考察，并藉以探讨乾嘉时期中国传统刑罚即已发生的“自发转型”问题。

今人有关中国古代刑罚的系统研究，当以蔡枢衡为最著，然其于明清时期的枷号刑未多措意。^④有关明清法律之专书，如杨一凡《明大诰研究》^⑤、中村茂夫《清代刑法研究》^⑥、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⑦等，于此亦未深论。值得一提的是，张世明在《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这一长文中，针对晚清西人旨趣下的枷号图，藉助翔实的资料和细密的考证，揭穿其伪捏之处，并对

【收稿日期】2012-06-11

【作者简介】陈兆肆（1982—），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杭州 310036

枷号刑的演变、定制、仪式、性质等内容，均有精要论述，其中对“长远枷号”刑有所涉及。^⑧此外，罗莉亚首以“清代枷号”为专题，对其渊源、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作全面考述，实有补白之功。不过，就清代枷号中之特殊一例——永远枷号而言，罗文对此仅有数百字的简介，不免有遗珠之憾。^⑨

一、从“律外之刑”到“著为常法”：清代永远枷号刑定制考

枷初为羈囚之戒具，滥觞于西周嘉石桎梏之制，而于北周正式立名。其为惩罚囚之刑具，则定制于明代。^⑩清康熙八年（1669）的例文规定，囚禁人犯惟用细链而不用长枷。自此，枷于制度上不再有戒具之性质，而专为刑具之一种。^⑪

有清一代，以枷为刑，或为附加刑，或为替代刑。清承明制，对窃盗再犯、奸赌等徒以及罪后潜逃之人，时于其应得之本罪外，附施枷号，以此羈束，并示羞辱，此为非独立的附加刑样态。缘因旗人乃维系大清国体之本，是故例文又作出了诸多旗民有别的规定，如“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⑫上述犯罪折枷的做法，是对带有军人身份之旗人的特别处遇。^⑬此处枷刑又呈现出独立的替代刑样态。

至于枷号的期限及定式，晚清律学家薛允升曾针对有关例文覆按“既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立枷号若干日之法，是五刑之外又有刑矣。前明枷号有重至百余斤者，此例改为不得过三十五斤，以示限制。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前明枷号日期，至多不过半年。本朝乾隆初年，以枷号至三个月为止，将旧例半年改为三月，与此酌定斤数，同一善政。乃后来条例愈烦，而枷号有至六月、一年及二三年，且有永远枷号者。”^⑭准薛氏所论，似乎是乾隆以降，枷号刑期渐次延长而呈乱世重典趋向，终至于永远枷号的出现。

晚清另一位律学家沈家本却将永远枷号的渊源推至明初。其在《历代刑法考》一书中多处指出：明初所颁布而作为大诰峻令之一的常枷号令，即清朝永远枷号之权舆。惟此种刑

罚，明初虽偶而用之，但并未立为常法，故《明史·刑法志》不详其制。而包括常枷号令在内的明初三项大诰峻令，均未见载于明中后期具有常法性质的《问刑条例》之中，“盖已废而不用矣！”^⑮据目前所见，《明大诰》中仅一则记载了明初常川枷号的适用情况，其中提及：当时上元、江宁两地的一干县民及军丁，偷出京师百里之外，私立牙行，对过往商民勒抑盘剥，最终被判为“常枷号令，至死而后已”。^⑯实际上，明初永远枷号作为当时层出不穷的重典之一，仍系权宜而用的“律外之刑”。

那么永远枷号刑在清代到底复起于何时，又于何时“著为常法”的呢？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理院在向朝廷要求“专其司法之责”的奏折中称“溯查此项（永远枷号）人犯，始于乾隆初年，至嘉庆后渐形稀少。迨至光绪二十二年，仅有太监永禄（即宣增泰）一名，由内务府遵旨发往黑龙江永远枷号监禁。迄今已及十年，京城及各直省并无此项人犯名目。”^⑰此折表明，永远枷号似乎复起于乾隆之初，衰于嘉庆朝而止于光绪年间。

大理院的想法与前揭晚清薛允升起初所论相似，但薛氏见解亦非一成不变，后经查阅雍乾年间的上谕，其又改称“永远枷号人犯起于雍正年间”。雍正六年（1728）年底的上谕勒令，自该年始，大理寺代替各衙门而在年终将永远枷犯“开列名单，写录所犯略节，缮折进呈；并将各案情由，另行详细缮折，随名单一并进呈。俱写汉字具奏。”^⑱然而，作为刑部官员的薛允升，当时仅止于见到上谕内容，而未能细察大理寺的相关覆奏。如雍正十年（1732）年底大理寺曾给雍正皇帝具奏过一份长折（内含朱批），内中摘叙多达四十五名永远枷犯的案情简况。据此折，其中首列的三名人犯早在康熙年间即奉旨拟定永远枷号，最早者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七月十七日。^⑲可见上述光绪末年大理寺以及晚清薛允升的看法皆不确切，此刑至迟于康熙四十九年已再现，而至雍正年间实已广为采用。

不过，从备载各朝例文的《读例存疑》中，未查见康雍年间有相关定例。实际上，在

未有正式例文作为司法依据前,此等刑案一般是在臣工具奏后“奉旨”而“钦定”。目前所见最早的成文法条,系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一则定例,其规定:

“各处永远枷号人犯于枷示已逾十年后,即咨明刑部汇题,分别发遣。若该犯原拟本系死罪并应发新疆者,发往伊犁。如原拟系应发黑龙江等处者,发往乌鲁木齐。其原拟军流以下者,旗人发往黑龙江等处当差,民人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系新疆地方犯事者,即照新疆等处互相调发之例办理。俱令配所各官严加管束。”^{②1}

此处永远枷犯一系死罪减等而改为军遣,一为实犯军流,皆为“仅下死罪一等”之重囚。刑犯在满枷十年后,因其原拟刑罚和各自身份不一,故发落地点亦有所不同。此处要问的是,乾隆五十一年,何以要对本为“至死而后已”无期刑枷犯,作出满枷十年而发遣边地的处理呢?嘉庆年间,地方大员对此已有不解。“永远枷号之犯,何得又有年满之期?”^{②2}《大清会典事例》如是提及当时的立法旨意“数十年来,每月支給口粮,且需官兵昼夜严密看守,稍有不周,难免滋生事端。查此等人犯,既已枷示多年,若久令安食糜费,转无以蔽厥辜,自应投界远方,使身受磨折,方足以儆凶顽而昭国宪。”^{②3}无疑,从人力、财力抑或惩罚效力来看,长期于本地枷示实属不经济,亦有失公正。而薛允升则又指出“乾隆年间因积匪棍徒等怙恶不悛,是以常川枷示九门,以昭警戒。后于五十一年,因此等人犯过多,特定有枷示已逾十年分别发遣之例。”^{②4}可见,当时“怙恶不悛”之犯甚多,已超出当地集中羁管的资源承受范围,于此也间接昭揭出乾隆后期乱世重典之迹象。

至嘉庆年间,又出现数条有关“永远枷号”的例文,如“禁止师巫邪术”门下规定:各项邪教案内应行发遣回城人犯有情节较重者,发往配所永远枷号;^{②5}“徒流人又犯罪”门下规定有:1、回民因行窃、窝窃发遣,复在配行窃,初犯枷号二年,再犯枷号三年,三犯即永远枷号;^{②6}2、发遣新疆并黑龙江等处为奴人犯,在配行窃至四犯者,拟以永远枷号;^{②7}3、发遣回疆改发巴里坤之犯,复行滋事

三犯,永远枷号。^{②8}

清廷平定回疆和卓之乱后,在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之同时,亦有意将一千囚犯发落于此,充当伯克之奴,故条文中多处涉及发遣“回城”或“回疆”者。上述“徒流人又犯罪”门中的第1条,规定回民人犯在配三犯行窃即永远枷号;而第2条中则规定,发遣新疆并黑龙江等处为奴人犯在配行窃至四犯者方拟永远枷号。这种对回民犯罪更为苛严的做法,与有清一代对回民总体上的歧视性政策相契合。^{②9}将嘉庆年间的例文与前满乾隆五十一年定例相参看,所变化者在其枷号地点已由发遣前的原犯事地变为发遣后之配所,而所惩对象亦突破此前的军流等犯而呈现出扩大趋向。不过前后一以贯之的则是,所惩刑犯均为所谓“怙恶不悛”之徒。

对永远枷犯的稽查奏报之责,例由大理寺而非刑部承担,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刑部和大理寺在处理同类重犯减免赦宥事宜时,常出现“彼轻此重,不能划一”之弊,即如道光年间大理寺卿福申所言“同案同罪之犯,而一系充军,一系永远枷号,即分隶两衙门具奏,又因所办罪名不同,向例不相照会,是以或宽或严,各不相谋,办理致涉两歧。此邪教军罪人犯得邀恩释,邪教永远枷犯不准开单,两门章程未能画一。”^{③0}然而,将永远枷犯的稽查之责交由“平反重辟、以贰邦刑”的大理寺,亦见朝廷对此等重囚的慎重之意。嘉庆年间,相关管理制度更加完备。如嘉庆十六年(1811),鉴于京城出现“贿嘱疏枷”案件,大理寺奉旨订立稽查章程,规定各直省督抚以及将军、都统对本地枷犯自行严查并咨复上报,而所有在京枷犯则由大理寺每月派堂官二员、司官四员,五日一次轮往查看,如有疏纵情弊,即行参劾,并于三个月后将查看情形据实上奏。^{③1}而对于枷号定式及咨报汇奏等定制,上谕勒令刑部等衙门将枷号尺寸斤两,开具印册,随时知照大理寺,以凭查核;而各督抚、将军、都统须将本地永远枷犯情形年终咨报大理寺,以备汇奏。各级上报之时间,亦应遵循相应的程限规定。^{③2}该年年终,大理寺在例行汇奏中即提及“外省永远枷号三起,人犯三名,在京永远枷号三起人犯四名”以及各案

简况。^②可见，当时的稽查奏报制度尚能得到切实推行。然而，嘉道以降，随着官场疲玩之习日甚以及永远枷犯本身之递减，遂致相关管理制度“奉行既久，几等具文，徒劳案牒之纷纭，无裨治平之化理”。^③

有清一代，永远枷号刑承袭明朝常枷号令而不断定制化。从现有材料来看，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再度使用此刑，雍正年间局部用于对旗人犯和政治犯的惩处，而乾隆年间则广为采用并加以制度化，及至嘉道年间其相关管理制度日益完善。总体而言，清代乾嘉时期，随着社会矛盾丛集并日趋尖锐，永远枷号刑由非正式的“律外之刑”而逐渐“著为常法”。不过，乾隆五十一年虽定有“枷示已逾十年分别发遣”之例，但晚清薛允升仍抱怨“何项应拟永远枷号，仍无专条”。实际上，其相关规定散附于《大清律例》的诸多律条之下，呈现出“一例分载各门”而流于“繁碎”的文本格局，故时已受到外来立法技术影响的薛允升，对传统律例体系中的“重列举而轻概括”^④的立法方式报以不满，亦在不免之中。

二、“所犯不一，其情各殊”： 清代永远枷犯的类型变迁及其时代

即如上揭，永远枷号刑的适用对象包罗多端，似无定指，雍正年间兼理刑部事务的和硕果亲王允礼言及“永远枷号者，有原拟斩绞改为永远枷号者，有原拟发遣流徒枷责改为永远枷号者，有兵丁跟役自军前逃回照例枷号者，有斩绞人犯在圈禁处奉旨枷号者。此等枷号人犯，所犯不一，其情各殊。”^⑤尤有甚者，清代康雍以降，有关永远枷号刑的实践做法，远远超出了律例的规定范畴（其间多有援引成案而定刑者^⑥），其施诸对象涵盖普通旗人、官员、太监以及民人。举凡官员渎职贪索、旗人恃强凌弱、太监吸食鸦片、民人悖妄疯颠等情事，皆在施刑之列。不过，就永远枷犯的历时变迁来看，固可看出“所犯不一，其情各殊”，但不同时代会集中出现一些新的不同枷犯类型，从而折现出不同时代的政治与社会风貌。

1、康雍年间的旗人恃强苛索之案犯及政

治性案犯

从雍正十年十二月大理寺上奏的四十五名永远枷犯情形来看，康雍年间的永远枷号的惩治对象，主要是一般旗人刑犯和官犯（包括政治性案犯），鲜见涉及普通民人犯罪。

此时旗人枷犯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旗官恃威苛索下属之案犯。如雍正五年（1727），协领明泰被遣兵镇守“事属初设”的宁夏驻防，后侵吞兵丁钱粮，为数甚巨，因而雍正帝以其“不比寻常犯赃之案”，而不同意刑部依例所拟“完赃减等”的初判，而改为“往宁夏永远枷号示众”^⑦的重惩。又如，雍正六年四月，驻守皇家陵寝的内务府总管佛伦勒索兵丁银两，上谕以“陵寝地方关系重大”为由，驳回依例所拟褫夺职掌的判罚，改判为“马兰关风水地外永远枷号示众”。^⑧上述两例旗人官员贪赃勒索案件，既有律例均有相应惩处规定，但视惩贪为急务的雍正帝却认为，此等官员均于特殊情势之下（如宁夏驻防“事属初设”或“陵寝地方关系重大”），竟敢背恩犯法，实属可恶，故而不同意以常法处之。这一不拘于定例的做法，一方面折射出传统的以“情”越“法”的司法实践模式，^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雍正年间有关既定例文已不敷时势所用。

旗人枷犯的另一类型则是民间恃强凌弱、横行不法之旗兵案犯。据上谕档显示，雍正七年（1729）三月初四日、雍正八年（1730）三月初二日、雍正九年（1731）六月初七日，频繁发生八旗兵丁“酒后”诈索案件。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名正蓝旗满人因讹诈山西民众案发，被审出诈骗等情十二款，总计讹索银两达八千余两。鉴于各地旗兵此类诈索行为，雍正帝作出了“永远枷于本旗高墙门外示众”的处置。^⑩又如，雍正十年十二月内，大同旗兵有七八人，恃强殴打当地铁匠尚宏谟。次年正月，镶蓝旗军铁头向当地民人杨禄买烟时发生口角，以刀背打伤杨禄。雍正帝针对此案指斥道“伊等俱系满洲兵丁，世受国恩，自出兵之后，并未效力行走，辄敢任意违禁，在地方生事，甚属可恶”，最终谕令当地驻防旗官，将此等妄行兵丁中为首二人，“即于彼处永远枷号示众”。^⑪

据雍正十年十二月大理寺上奏的四十五名永远枷犯情形来看,雍正年间旗人所犯事由,除了上述类型以外,颇为繁杂,或为偷创人参,或为斗殴混行,或为肆窃聚赌,而许多案例皆间接揭示出旗犯生计之困境。据定宜庄的研究,雍正朝以降的八旗驻防之设,更多地出于政治以及八旗生计方面的考虑,而军事征服的需要转而置于次要位置。^⑫另有学者指出,自雍正年间开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⑬职是之故,雍正年间,本因经济困境而被大量派驻各地的旗人,复因生齿日繁、职业限制等因素,生计更加窘迫。恃强苛索凌虐民人之事,虽自清初即有,但至雍正年间即已更趋严重。^⑭雍正朝以降,以永远枷号刑来责处这些恃强凌弱的旗人罪犯者屡见不鲜,皆旨在通过这种延长刑期的枷号公开仪式,一面使当地所有旗人畏威而敛迹,同时又对当地弱势的汉人群体起到直接的心理抚慰作用。

雍正年间,永远枷号刑的适用对象不少系政治性案犯,如雍正五年六月十一日,镶红旗传昌因被认定“必谁之党羽中人”,因而照“在朝官员交结朋党律”拟斩监候,后奉旨宽其斩罪,交与九门提督阿齐图永远枷号;雍正六年,镶蓝旗中书韦驮保,在“伊兄菩萨保与隆科多结党”之时,自身“行贿钻营”,后经朝审而将韦驮保“从宽免死”,交与九门提督永远枷号示众;又如雍正九年十二月初九日,雍正政敌允禔之子五达塞授意镶黄旗塞奔改诗,语涉悖谬,因而被永远枷号在允禔府门外。^⑮《永宪录》记载下了两则类似的政治性案件:一则是雍正元年,因政敌允禔之家人雅图等否认了雍正帝对允禔“在军闻有吃酒行凶之事”的指控,而将他们“拿送刑部,永远枷号”。^⑯另一则是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捕拿了年羹尧的族人,即候补副使年如、四川建武游击年悦,将其“永远枷号于廉亲王府”。^⑰雍正十三年(1735)的上谕称“据显亲王将雍和宫所属地方枷号锁禁人犯查明援赦具奏,朕思各处高墙及九门亦有似此等问罪人犯,着将此折交与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将各处高墙及九门所有似此永远枷号等犯俱行查明,

是否与恩诏赦款相符之处,一并分别议奏。”^⑱可见,当时因卷入党争而被羁于宫廷要地或失势诸王府门的永远枷犯甚多。尽管“雍正即位”是合法继位还是阴谋篡位,至今仍是一桩为学界所聚讼的悬案,^⑲但于其执政前后,朋党林立、权争激烈则为显明之事实,而介于死刑与军流之间永远枷号刑,在雍正帝对那些政治轻犯或从犯们进行惩罚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是时,雍正帝亦藉此公开的刑罚仪式羞辱和警醒政敌,并宣告自己在政治上的最终胜利。

2、乾隆年间所谓“煽惑”性案件之从犯以及边疆欺饰妄报之军犯

乾隆年间是永远枷号刑定制和泛滥化的时期。其适用之广,远迈前朝,不再局限于旗官群体,已波及普通民人犯罪,这在总体上与乾隆年间力图消弭旗民法律上差异处遇的构想相契合。^⑳除了康熙年间的案犯类型之外,此时又出现了两种突出的类型,即“煽惑”性案件之从犯以及边疆战场上欺饰妄报之军犯。“煽惑”二字,频现乾隆年间的公牍奏章之中,以说明一些案件本身在共时或历时方面所具有的煽动鼓惑效应。

具体而言,首先有聚众抗官之案犯。如乾隆十三年(1748),江苏苏州府城针对米价飙涨而发生“哄闹”事件,是时“有市井贩夫顾尧年者,倡言请平米价,自缚衔刀,哭吁抚轭,从而和者纷如聚蚁”,^㉑后奉旨将首犯顾尧年等三犯立毙杖下。旋即,青浦县朱家角发生“罢市”一案,地方官同样将秦补等首犯立即正法。乾隆帝鉴于“近日聚众之案甚多”,而对上述做法深表赞同。但在此等案件中,一些身为从犯而不便一概处死者,若照旧拟为军徒,易致脱逃而再滋事端,最终议定“二案从犯内,如陆高枣子、坏枣子等私立此等名字,必系无赖匪棍,皆应永远枷号,以儆凶顽。”^㉒面对时势乱象,无论是对首犯还是从犯,清廷皆作出了就地正法及永远枷号等“律外之刑”的重惩处置。就地正法和永远枷号,虽施刑方式不同,刑罚轻重亦有别,但均突破繁冗的逐级审转之定制,强调即时即地性,冀望在非常之际以“非常之法”迅速有效地遏制当地事态的扩大。不过,与就地正法

相比较,永远枷号刑这种延时颇长而“传示九门”的戏剧性刑罚景观,自能弥补其“宣教时长不足”和“宣教空间有限”^{⑤3}的双重缺憾。

其次为勒索之案犯。如乾隆十七年(1752),福建福鼎、霞浦二县发生“奸民勒借强买”之案,地方官奏称已将首犯陈士乐杖毙,并拟将其余案犯分别杖徒枷责发落。但乾隆帝却认为“此等刁悍不法之徒,藉端肇衅,号召乡愚,逞强肆横,渐至闻风效尤,良民被其扰累,最为地方之害。况闽省民俗嚣竞,濒海杂棚,易于煽惑。其敢于勒借强买者,类出于强有力之辈,并不为觅食求生起见,非严惩无以儆众。”因此勒令地方官员:“应摘其案大而情重者,永远枷号示众。俟二三年后,酌量加恩宽宥,庶受刑者知所悔而旁观者知所惧,正所谓报虐以威,不可稍存姑息之见也。”^{⑤4}上谕通过指出“勒借强买者”大率出于豪强而非贫民,以强调其罪行“情无可原”的恶劣程度,进而赋予永远枷号刑的“合道德性”。同时认为闽省“勒借强买”已呈“闻风效尤”之势,因此急需以“刑罚的扩散效应”来遏制这种“罪行的扩散效应”,以此凸显永远枷号刑的“合工具性”,正所谓报虐以威,刑期无刑。

另有强抢之案犯。如乾隆十七年,浙江温州、台州属县发生“奸民强抢米石”的案件,后地方官仅作“大枷枷号,遍游城乡两月”的处理,引来了乾隆帝的大为不满,上谕指出此等团伙强抢罪犯“鼓惑乡愚,肆行不法,最为地方之害,必当示以重惩,方足禁遏刁风。即其罪不至死,亦不可拘泥常例,仅予枷号两月。应令永远枷号,俟一二年后,酌量省释,奸民庶知儆惕”。上谕末段评议性文字颇能反映出永远枷号介于死刑与军流之间的折中性,其言“过严,则以求生迫急之灾黎罹于刑宪,实可怜悯;过宽,则强梁纵肆之徒,一呼百应,更虑酿成事端。”^{⑤5}在乾隆帝的眼中,可怜之“灾黎”与可恨之“强梁”之间随时可发生转换。不过,上谕尽管标榜永远枷号宽严持平的特性,但谕旨显然是针对地方官“拘泥常例,仅予枷号两月”的做法,而作出了永远枷号的重惩。值得注意的是,谕旨中

“永远枷号,俟一二年后,酌量省释”一语,则表明“永远”二字名不副实。本含有“无期”意味的“永远枷号”刑,在实践中往往因为下文将提及的管理成本等问题而呈现出“不定期”色彩。当然,雍正后期及乾隆初期,这种改“无期”为“不定期”的做法,其初衷亦想予枷犯以“改悔即可省释”的冀望,这种类似于后世“累进处遇”的意旨在此后的上谕中一再得到体现。^{⑤6}

上述案例中,聚众抗官属于典型“煽惑”性案件,造意者振臂一呼,响应者“纷如聚蚁”,其关涉人数既广,波及空间亦大。而上谕在谈论“勒借强买”、“强抢之案”案件时,一方面指出其已经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则更为警惕其“鼓惑乡愚”、“号召乡愚”之潜在的后续影响。总之,几种案例皆因犯罪行为本身极强的扩散效应而引起格外重视,故以永远枷号作惩处,欲使“受刑者知所悔”的同时,实更在意令“旁观者知所惧”,从而遏抑此类事件的复制蔓延。乾隆时期,在迎来盛世的同时,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问题丛生,各方矛盾空前尖锐,^{⑤7}是时“煽惑”性事件接续发生,已显山雨欲来之势,正如戴逸先生在分析乾隆时期“预防性反应”的文网政策出台之背景时,颇有启发性地指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尚未展开,但零星的反抗已渐频繁,统治者日益感受到来自下层反抗的威胁”,故而“统治者谋求安全的心理,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服,将达摩克里之剑预先悬挂在可能的叛逆者的头上。”^{⑤8}

乾隆时期,针对边疆战场上欺饰妄报之军犯,永远枷号刑亦频繁使用。乾隆初年,在与漠西准噶尔作战时,都司沈瑞龙告病擅回军营,乾隆帝不同意递回刑部治罪,而鉴于当时军中“疲玩之习渐染已深,不可不力为振作”,拟将沈瑞龙“永远枷号,军前示众”。^{⑤9}在康雍乾数十年间清廷与准噶尔旷日持久的拉锯对峙之下,远道参战的清军将领疲倦怠玩之风日益严重,而此时永远枷号则充当着“力为振作”的一剂猛药。

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军与回疆和卓军队发生战争。清军驻阿喇古卡座的索伦佐领罗颇里等人遇到和卓军队,未与之激战,反而

接受敌军之粮，由其指路而还。罗颇里考虑遇贼示弱，恐被追罪，因而在上奏中“转将给粮指路之人，诬为抢掠之贼”，谎报力战而退。乾隆帝知悉真相后指斥“欺饰妄报如此，理应正法，念其尚能与贼接战，未至望风逃窜，姑从宽典。但仅予斥革，不足蔽辜，着将罗颇里永远枷号示众。再有似此者，定行正法。”^④无独有偶，乾隆四十九年（1774），漠西蒙古处佐领魁亮带领其属下之人，在卡外打猎，“猝遇贼人，遽无踪影，而又捏报寻马未回”，同样被责令“在彼处永远枷号”。^⑤与其说上述做法是免其死罪而从宽处理，毋宁说是藉助人体枷号仪式，使其充当一本极具观感的无字刑典，以为来者之戒。

乾隆五十一年，台湾爆发声势浩大的林爽文起事，初始清廷一度失势。次年，乾隆帝对赶赴台湾战场的清军将领田蓝玉始则捏报继而怠玩的行为，下令将其革职，并在台湾府城永远枷号示众。^⑥又，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军反击进犯藏地之廓尔喀，而作为在镇压林爽文起事中建有功勋的副都统鄂辉，此时被查出两年前曾对廓尔喀呈表贡搁置不奏。大将军福康安奏请“将鄂辉等解京治罪”，但乾隆帝却驳道“试思解到后，即交军机大臣覆讯明确，亦不值即将伊三人概行立实重典；若交部监禁，是伊等身获重谴，转藉此回京安坐图圉，殊不足以示儆”。因此在这种死罪为重而监禁又轻的两难境地，乾隆再次推出了永远枷号之刑，并且尤为强调“即时即地”加以惩处的必要性，故其下令“不拘鄂辉解到何处，即于该处截留，仍解回前藏，交与和琳，将伊永远枷号，与俘习浑、雅满泰同为在藏办事大臣不肯用心妥办致藏地不靖者戒”。^⑦一年之后，乾隆帝以廓尔喀之役业经藏事，藏务均已完结，又将鄂辉释回京城。^⑧本为无期刑的永远枷号，在实践中异变为“不定期刑”，亦为上谕随时省释枷犯以示皇恩浩荡提供了若干便利。

乾隆帝在位期间，边疆扰攘不断，其晚年亦自誉有“十全武功”，前述所谓平定准噶尔之役、勘定大小和卓之乱、镇压林爽文起事以及抗击廓尔喀来犯，均在其列。然诚如近人孟森所言，所谓十全武功者，大率属于“救败

而非取胜矣”。^⑨足见当时边疆战场，未能尽如清廷所愿。边疆之战，远在千里，既难于稽查，且易于谎报，故而上奏信息的真伪与否，在乾隆帝心中，既影响其运筹于千里之外的决策，又关乎其堂堂一国之君能否有效驾驭边将的威严。因此，对欺饰妄报之轻罪将官，乾隆帝虽于特殊时期不便置诸重典而自折羽翼，但亦不能任意姑息而长颓玩之风，遂转而采用折中的永远枷号之刑，配合擅启枷锁之禁令，^⑩以敲打和警示边疆军士不得文过饰非、有意欺瞒。

3、嘉道以降“邪教会匪”等犯及太监吸食鸦片或擅逃之案犯

嘉道年间，涉及教门案、会党、传教案的永远枷犯与日增多。此外，道光年间，以永远枷号刑处置太监的案例亦成为新的突出类型。

嘉庆二十年（1815），四川总督审办一起天主教传教案，其中西洋传教士徐德新因被控“创造不经之言，煽诱愚氓，以致川省习染西洋邪教者日多”，^⑪最终被立即正法。而“抗不悔教”之唐正玳等三十八名从犯被拟遣新疆，给额鲁特为奴。但上谕却认为，将三十八犯概行远戍，对原犯事地点反而无以示警。因此降旨四川总督“于各遣犯内，择其情节较重者数名，在于各该处，永远枷号示众”。最终，年已八十的张万效被处以永远枷号刑。^⑫同年又发生一起传教案，唐伯猴等十四名“抗不改悔”者，被谕令“与朱荣等案内柳怀德等十名一并永远枷号。此次枷号之唐伯猴等二十四名及先经枷号之张万效一名，俱飭该地方官随时稽查”。^⑬在清廷的眼中，“抗不改悔”正显示其“怙恶不悛”的顽劣本性。

嘉庆二十一年（1816），河南鲁山等县又出现“倡立邪教惑众骗钱”一案，其中年逾七十的宋王宾等四名案犯，同样由发遣而改为“在豫省犯事地方分置各处，永远枷号，并将该犯等犯事案由标明晓示”。并且随后上谕即规定，嗣后各直省，遇有“倡立邪教、惑众骗钱”案内应行发遣之犯，均照此案，酌留一二名，于该省犯事地方永远枷号。^⑭同年，贵州册亨州人闻绍修与福建连城县人黄云和被严老三等人“诱胁”加入添弟会，而被当做教案从犯而拟遣边疆，旋被改判为永远枷

号。^①至其缘何改判，即如当时直接处理此案的贵州巡抚文宇所奏“再查此案拟遣人犯五十八名，闻绍修一犯系兴义府属册亨州人，在本地各犯内年力较衰，是拟留该处永远枷示，俾与该犯素识者可以触目警心。黄云和一犯与已正法之严老三、严老五俱系闽人，寄居兴义地方。该处闽人贸易者居多，是以亦拟留于该处永远枷示，庶客民咸知畏法，不敢复行勾结。”^②

对上述闻绍修等人而言，以其年力较衰为由，将其由发遣远方而改为就地永远枷号，似乎是格外垂恩的仁慈之举。然而透过贵州巡抚的奏议可以看出，永远枷号刑之深意重在使旁观者“触目警心”，且旁观者乃为特定的预设对象（即假想中的潜在犯），因此年力较衰刑犯其所“素识者”，自比年轻刑犯为多。而该案的肇事主体既为寄居兴义的闽人，故理当择其一二予以枷示，以儆客民。

又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九月十二日，李荣、王忠等人本系“大乘教邪匪”，因仅限“烧香敛钱”，罪情较轻，悔后责释。但后来“仍复烧香敛钱，王忠并夤缘在番役家教读，探听信息，迹类奸细，均属怙恶不悛”。^③李荣、王忠照例应发遣回城，枷号三个月。然而，嘉庆帝认为，该犯等在三月脱枷后“转得安居配所”，如此判法实不足以示惩，著令李荣、王忠俱毋庸发遣而作永远枷号处理。有意思的是，嘉庆帝为了扩大枷号的示警影响，特将二人分枷于京城顺天府衙门和步军统领衙门两地，并冀望以此为诱饵，拿获其伙党，不过，后来伙党未获，却起到了“煽惑”路人之效，则为其始料不及。^④

嘉庆年间，各地教案频频爆发，至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除京城因涉及教案被永远枷号的李荣、王忠二人以外，当时各直省尚有另外十五起教案，被永远枷号者尚有二十九名之多。而依照惯例，大理寺每届三月，将永远枷号人犯奏闻一次，皇帝在披览时遇有情节较轻者，仍会酌量宽释。但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却特下谕旨，对于涉案人犯，如有永远枷号示众者，皆罪在不赦。^⑤这种对涉案人犯严惩不贷的决心，亦间接揭示出当时民间教案问题的严重性。

嘉庆元年至九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发生了大规模的白莲教反清起事。此外，小规模教派起事时有发生。^⑥自此之后，清政府几成惊弓之鸟，在律例“禁止师巫邪术”门下屡颁严令，如嘉庆二十年对传统“左道异端”例条的改定，嘉庆二十年、二十一年议定传习白阳等教分别治罪例条，嘉庆二十一、二十三年定立“倡立邪教惑众骗钱”的例条，嘉庆十六年，二十及二十二年议定“西洋人内地传习天主教”等例条，^⑦通过严法重典打击“邪教”传播行为，以期遏乱于未萌。于此背景下，永远枷号刑在惩戒教案从犯以及震慑未犯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嘉道年间，永远枷号刑的另一主要适用对象是太监群体。嘉庆年间，鸦片吸食者已从沿海渗透内地，甚或蔓延宫中。是时，清廷禁烟之重心亦逐渐由禁贩转向禁食，而永远枷号刑即成为禁止宫内太监吸食的一个重要法律举措。如嘉庆十八年（1813）紧急谕令“有告假在外，或潜住私宅及在他处吸食者，将首领太监永远枷号。”^⑧道光十九年（1839），内务府又做出重惩规定“在外围值房吸食者，枷号六个月，发极边烟瘴，永远枷号，遇赦不赦。至陵寝首领太监等有吸食者，照外围办理。其王公门上及各大臣宅中之太监等有吸食者，交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⑨此时以吸食鸦片之太监为枷号施刑对象，亦不无敲打群僚之意。

嘉庆以后，尤其是道光年间，涉及太监群体的永远枷号案件骤增，但更多的是涉及擅自逃跑事宜。从现有满汉文档案来看，康熙年间曾数次讨论太监逃跑议罚事，但均未有相关专条载入律例之中。^⑩嘉道以前，出于惹是生非后恐被责罚或因事繁役苦而不堪其重，虽偶有太监借出宫办差之便而陆续潜逃宫外，但并非是群体性的普遍行为。然自嘉庆朝始，因宫廷警卫制度日渐废弛，太监得以轻松逃出宫外。而道光以后，内忧外患弥重，宫廷治安每况愈下，太监逃跑者数量更是惊人。随着太监逃跑事例骤增，相关惩处亦随之加重，而以永远枷号惩戒此类屡逃之犯的做法，即其一端。

道光六年（1826），内务府奉旨议定《逃走太监治罪例》，其中规定，刑罚强度据逃走

太监的罪性程度大小而递增，惩罚手段由减食罚银、铡草苦役、杖责以至永远枷号不等，如“铡草未满年限逃走，及五年期满交进后复行逃走，无论投回被获，俱永远枷号。”^⑧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十八日，常犯吴甸铡草太监王寿征一名，因在圈逃走，即照此例永远枷号，发往吴甸示众。^⑨道光七年（1827），管理宫廷戏剧演艺事务的升平署，援据上述内务府定例，制定专条以惩治应差太监逃走之行为，所不同者在于将上述减食罚银、铡草苦役等易为“不准告假”或“枷号”等惩处方式，而逃走之太监，无论主动投回还是被获，至六次，俱永远枷号。^⑩道光十三年（1833），鉴于逃跑太监的泛滥化，相关规定又明显重于从前，且作为附加刑的枷号，其使用频度已大为增强，内中即有“如释回复逃及未满年限潜逃者俱永远枷号”的规定。^⑪道光十七年（1837），内务府大臣再次奏议《逃走太监治罪章程》，此时对于逃跑太监的惩处力度，不仅与其先前逃跑次数有关，亦与其逃离京城之远近有关，即“太监逃至河南、山东、山西及东三省，枷号一年，发往黑龙江给官员为奴，遇赦不赦。如逃至各省，即系越省远颺，永远枷号禁闭”。^⑫“越省远颺”无疑令清廷对逃跑太监之人身及其传播宫中秘辛之行为，更不易控制，因而倾向加重惩处。而据此处“遇赦不赦”甚或“禁毙”等词眼可以看出，内务府屡次更新《逃走太监治罪章程》的背后，是太监逃跑问题的日益严重所带来的既有惩处方式的无力以及惩罚强度的日益加重。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二十日，常犯逃走太监崔贵一名，因逃走越省远颺，经慎刑司审明，即照该例永远枷号在慎刑司。^⑬

被处永远枷号之太监，初始均在内务府慎刑司羁禁，原以此等太监“愚顽性成，就近枷示，以昭惩戒”。但咸丰元年（1851），有人鉴于此类枷示太监人数膨胀而看守人员不足，奏请将就地枷示改为发往黑龙江永远监禁。但上谕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其以若此“恐稽查难周，或仍致在配脱逃，转不足以示儆”为理由，最终还是谕令就近枷示，惟嗣后永远枷号之太监若积聚较多，即令分散枷示于慎刑司附近的番役衙门，而由管辖番役司员

等妥为稽查。^⑭有趣的是，此处上谕仍执意将被拟永远枷号的太监就近发落而不同意改发黑龙江，与下文将提及的早在嘉道年间上谕已允准将教案中从犯发落地永远枷号的做法迥乎不同。其间深层缘由，似与上述对“越省远颺”者加重惩处的条例有着同样的考量，即对特殊身份的太监远离京城后流播宫中秘辛的疑惧。

对太监逃跑的不断加重惩处，昭揭出朝廷对贴身近宦控制力的日益削弱，同时亦折射出皇权的败落和国运的衰微。清季，一方面随着西方的“文明刑事观”的传播，以及崇尚自由刑的新式监禁制度的移植，包括枷号刑在内的传统的身体刑和耻辱刑在此映衬下显得“有失文明”。时任顺天府尹的孙宝琦奏请废除枷号，即以“用进薄海文明之治”为据。^⑮而另一方面，行至清末，在凌迟、枭首、戮尸等重法业已废止而笞杖轻罚亦改为折赎时，仍予施行的枷号刑其自身的弊病日益显现，如当时法部所言“押游街市，标识里闾，隶役藉以凌辱，路人恣为嘲笑，积羞成忿，窃恐弱者蓄怒待发，而强者益反唇相讥，其事后之挟恨寻殴，尤所不免。”^⑯此外，枷号刑的存在，尤其是旗人犯罪折枷的法律规定，在晚清革命浪潮涌动的背景下，易被汉人视作满汉畛域而备受歧视的佐证，从而导致“法不一则民志疑，斯一切索隐行怪之徒，皆得乘暇而蹈隙”，因此沈家本等人亦力主废除枷号。^⑰鉴于上述，清季枷号人犯最终大多被折赎释放，而无力完纳赎金者则被禁于新式罪犯习艺所中充工，永远枷号刑亦随之退出司法实践的舞台。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任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奉旨将《大清律例》中三百四十四条例文删除，其中以“旧例久经停止而例内仍行存载者”为由，最终将永远枷号刑从法律文本中剔除。^⑱

三、“变中有常旨”： 永远枷号刑的内在理路分析

永远枷号刑的适用对象，虽其情各殊，且不同时期又会集中出现反映时代特征的新的案犯类型，但就总体而言，其适用对象均系形成

了一定之规模和相当之影响的犯罪群体，而犯案者即如资料所揭，一般皆以“甚属匪类”、“甚属凶恶”、“形同无赖”、“胡行光棍”、“大恶乱光棍”等词眼来加以形容，有时亦在枷上标示“蝎子张”等诸如此类的混名^②，以反映其共通的“怙恶不悛”之本性。

作为本质上属于无期徒刑种的永远枷号刑的最终出现，缘于传统军流等重刑无力应对一干“怙恶不悛”之重犯（较死刑为轻，较军流又重）。以既定之军流等刑惩处此等重犯，流弊甚多，或使罪犯安居囹圄或配所之中，转而不足蔽其辜，或因松散的配所管理而致其逃脱后再滋事端^③，均无法通过有效的身体管束而达到示惩或防其再犯的目的。与此情形极为相似的是，在乾隆时期，亦缘于传统的杖徒等轻刑在处置一干“怙恶不悛”之惯窃等轻犯时，同样因无法有效对其进行身体管束而达到示惩或防其再犯的功效，最终被强调身体管束和时空规训并重的自新所取代。^④综合上述两例，因司法人力和物力成本有限等因素，传统刑罚总体上强调对身体的即时损伤性的惩罚，而不太重视对身体有效的技术性管束以及时空规训的延展^⑤，即在施加传统刑罚以后，犯人仍保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甚至极易逃脱，因此这对于“一息尚存惟作奸是计”的“怙恶不悛”之徒，无疑更是致命的缺陷。如何对日益增多的“怙恶不悛”之犯实施有效的羁束和惩罚，最终在清代乾隆年间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难题。而永远枷号取代传统重刑以惩处“怙恶不悛”之重犯，与自新所取代传统轻刑以惩处“怙恶不悛”之轻犯，均定制于乾隆之际，深刻地反映出彼时传统刑罚在应付社会犯罪情势时普遍无力，也再次佐证了中国传统刑罚体系实则于乾隆以降即循其内在理路而出现“自发变迁”，洵非迟至晚清外来法制传至中国时才骤然而变。

永远枷号刑之所以广为适用，除了传统刑罚不敷时势所需外，还在于其能通过各种刑罚的展示技术，充分发挥刑罚的多重意旨。学界一般认为，刑罚之旨意，除对已然之犯实施报应一端外，亦有对潜在之犯实施预防之目的。而预防之目的，又歧为二种，一是藉惩戒罪犯而防其自身再犯，是为特殊预防；另一则是为

藉惩戒罪犯而防止他者犯罪，是为一般预防。^⑥永远枷号刑乃寓预防之旨于报应刑之中，正如乾隆十七年的上谕所指出，“摘其案大而情重者，永远枷号示众”，“庶受刑者知所悔而旁观者知所惧，正所谓报虐以威”。^⑦“报虐以威”一语表明其典型的报应刑色彩，使“受刑者知所悔而旁观者知所惧”的用意则反映其兼顾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双重目的。尤值注意的是，透过文中大量案例，在特定的乱世之际，清廷对“一般预防”的格外重视，往往易致将“法律案件”升格为“政治事件”来加以处理。正因如此，一些如同永远枷号的律外之刑才被推至历史前台，并在频繁的政治化运作中趋于定制。

就其实现这些刑罚意旨的总体方式而言，永远枷号借助公开枷示的耻辱刑，欲令受刑者与旁观者有耻且格，并一般通过“常川枷示各门”的做法，使得规训示教效果在时空两个维度臻于极致。不独如此，还在枷示的技术层面上颇费思量，如有时通过标示“犯事案由”或“混名”，以示羞辱和警儆；又如在前述各类案例中，出于节约司法成本以及发挥“即时惩戒力”，有司均强调枷示的即时即地性，有时不惜打破司法上兼有慎重民瘼和标示权阶之意的逐级审转复核制，而强调就地枷示，不必层层审转。枷示地点除了最普遍的“九门”之外，或“于河工险要地方”（督修河工不力之官员），^⑧或“于马兰关风水地外”（管理陵寝不善之大臣），或于“军前”（战场欺饰怠玩之将官），或“赴各寺轮流示众”（恃强凌虐之僧侣），^⑨或于“宗室营房前”（狐假虎威之宗室跟役）^⑩。凡此不一，要皆视其潜在的同类犯（即欲震慑警示的特定对象）所处何地。这种做法与清朝每于“匪盗横行”之动荡不安的情势下，推出同样强调即时即地性的“就地正法”实有同样的考量。^⑪

永远枷号刑的产生虽有其内在的深刻动因，而于推行之初在刑罚旨意及行刑效果方面亦有深密考量，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遭遇诸多有违初衷的困境。首先，永远枷号刑的实施，有时非但不能示警于旁观者，相反却起“煽惑”之效。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教案内永远枷犯李潮选于本地枷号，“原令习教之人

触目警心，共知儆戒，乃仍有匪徒前往访寻”。^⑧鉴于此，嘉庆二十四年（1819）改定例为“各项邪教案内，应行发遣回城人犯有情节较重者，发往配所永远枷号”。^⑨又如，道光元年（1821），直隶总督方受畴奏请“邪教案内留于本境永远枷号人犯请即行解配”，其理由正是“邪教案内应行发遣人犯，留于本境枷示，原以化诲愚蒙，俾知儆戒。今本犯既不知改悔，匪徒复踵习其教，自不若投之遐荒，免滋煽惑”。^⑩有清一代，正是在“示警”之念和“煽惑”之防的意图更迭或转换中，永远枷犯的行刑地点总是在原犯事地和发遣之边疆之间摇摆不定。此外，永远枷号刑主要是针对发遣犯的附加刑罚，但亦有不少是对“究系罪不至死，则原犯重情不无一线可原”的死刑犯的减等处理，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名轻实重，永远枷犯“历时已久，因年老衰残染患疾病或至痰毙，是以罪不至死之犯，仍系因法致死”。^⑪

晚清沈家本在谈论刑罚的“公行”和“密行”问题时，极富洞见地指出公开行刑的弊端，如稔恶之徒在临刑之时，“谩骂高歌，意态自若，转使羣民感于气类，愈长其凶暴之风。常人习于见闻，亦渐流为惨刻之行”。^⑫凡

此皆有违明刑弼教之初意。福柯亦指出残忍的公开行刑景象，有时会使用犯成为观者同情和膜拜的对象，而司法施刑者则会变成一致声讨谴责的刽子手，因此实有必要将公开的惩罚规训转向秘密的监禁规训。^⑬实际上，从乾嘉年间的“牢固监禁并永远枷号刑”的出现以及相关案例，亦能看出类似这种微妙转向之端倪。如乾隆年间即被永远枷号的江苏句容县华山寺僧人雨堂，历时二十余年，几乎传示江苏通省，时至嘉庆二十一年，两江总督百龄等人担心若继续轮流游示，即难保“不别生诡计，再滋事端”。最终将该僧在重责以后，提收江苏臬监，“严加镣铐，牢固监禁，仍钦遵原奉谕旨，永远枷号……不许其僧俗亲属进监探视，以杜邪妄而示惩儆”。^⑭晚清之际，“常川九门枷示”的公开行刑更是普遍被“牢固监禁并永远枷号”的秘密行刑所取代，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擅逃之太监宣增泰在解往黑龙江后，即被处牢固监禁并永远枷号。^⑮可见，因其公开枷示所带来的弊端，永远枷号最终被“牢固监禁并永远枷号”（亦可谓“永远监禁并枷号”）所取代，而由“牢固监禁并永远枷号”折变为单一的“永远监禁”，则有待后来监守技术的发达以及枷号刑的彻底废除。

*本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CZS029。

①尤韶华《明清充军同异考》，参见苏亦工主编《中国历代法制史考证》（甲编，第7卷-清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21—442页。

②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三，名例律上之三，徒流人又犯罪例49，光绪三十一年翰茂斋刻本。按，无论是枷号抑或锁带，初皆为系囚之戒具，后来均出现了“刑具化”的趋势。

③关于永远监禁刑，参见《敕典章程·永远监禁并枷号议限查办》，载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七册），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第310—313页。

④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⑤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1页。

⑥〔日〕中村茂夫《清代刑法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第72页。

⑦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213页。

⑧张世明《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清史研究的新境》（第五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52—55页，第61页，第65—67页。

⑨罗亚莉《清代枷号研究》，2010年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论文，第22—23页。

⑩⑪关于枷号刑的因沿变迁，参见孙宝琦《法部奏议覆变通枷号并除去苛刑折》，载《东方杂志》第6期（1907年6月），第274页。

⑫⑬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一，名例律上之一，五刑-3，以及薛按。

⑭赵尔巽等《清史稿》志一二五，刑法二，民国十七年清史馆铅印关内本，第2317—2318页。

⑮清朝律例中“犯罪免发遣”条，直接肇源于明朝律文名例中的“军官军人免发遣”条，两者名异而实同，皆起因于军事上的特别考量。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等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第2032页。

⑯⑰⑱⑲《历代刑法考》，第64、327页，第1932

页,第2032—2033页,第2061页。

⑪⑬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辑《大清新法令》,何勤华等点校,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0页。

⑬⑭⑮《读例存疑》卷六,名例律下之三,徒流迁徙地-36。

⑰⑱《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06—816页。

⑲⑳祝庆祺等《刑案汇览》,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29—2030页,第384页。

㉑㉒昆冈等辑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四五,刑部,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6年,第15003页。

㉓㉔《读例存疑》卷一八,礼律之一,祭祀,禁止师巫邪术-4、6、7、8。

㉕㉖㉗《读例存疑》卷三,名例律上之三,徒流人又犯罪例-10、12、40。

㉘参见王东平《〈大清律例〉回族法律条文研究》,载《回族研究》2000年第2期。

㉙大理寺卿福申等《奏请酌改永远枷号人犯章程事》,道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档案号:03-4027-0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馆”)。

㉚大理寺卿贵庆等《奏报议定稽查永远枷号人犯章程单》,嘉庆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档案号:03-2175-028,一档馆。

㉛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四三,大理寺,第17500页。

㉜大理寺卿贵庆等《奏报核查在京及外省永远枷号人犯数目情形事》,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档案号:03-2175-033,一档馆。

㉝黄静嘉在提及清朝例文之“繁碎之弊”,曾提及清代“重列举而轻概括”的立法技术在方法论及思维上的基础及其与西方立法技术的殊异。参见黄静嘉《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4—275页。

㉞㉟兼理刑部事和硕果亲王允礼等《奏为遵旨办理在京在外永远枷号各犯查明情形陆续具奏事》,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档案号:04-01-30-0355-012,一档馆。

㊱㊲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卢荫溥等《奏为请将遣犯尹明义永远枷号事》,道光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3-3869-023,一档馆。

㊳《雍正上谕内阁》卷六八,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上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㊴传统的司法语境中,“情”的语义极为丰富,除作“人情关系”俗解外,尚包括“情势”、“情状”、“情节”之意。

㊵《雍正上谕内阁》卷一二八,雍正十一年二月上谕。按,类似的事情在当时驻防旗地多有发生,可参

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0册,第620页。

㊶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出版社2003年再版,第44页。

㊷《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㊸参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57页,第243—246页,第259—260页。

㊹萧爽《永宪录》卷二上,雍正元年,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0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08页。

㊺萧爽《永宪录》卷三,雍正二年,第249页。按,年如、年悦皆年羹尧族人,罪后枷于雍正帝政敌廉亲王胤禩之府邸门前,疑与胤禩过从甚密,待考。

㊻《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7页。

㊼关于对此学术公案的各派观点的梳理,参见张双智《雍正继位新解》,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83—84页。

㊽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八卷·清),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553页。

㊾署理江苏巡抚安宁《奏为顾尧年秦补二案首从各犯遵旨分别轻重办理事》,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档案号:04-01-01-0156-045,一档馆。

㊿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九,清光绪九年刊本,第5324页;另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一六,乾隆十三年六月丁卯,中华书局1986年,第199—200页。

①福柯针对西方中世纪的刑罚而指出,公开性刑罚具有复制和扩散的惩罚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刑罚所具有的政治宣教功能。以刑弼教,寓教于刑,亦为中国传统刑罚的应有旨意。此不独言以礼入法之条文本身所具有的政教或刑教合一的色彩,亦指传统的公开刑本身之仪式性所给“旁观者”带来的教育意义。

②㊿《清高宗实录》卷四一四,乾隆十七年五月乙丑,第417—418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四一二,乾隆十七年四月壬寅,第390页。

④如雍正十年的上谕即规定,大理寺于每年岁底例行稽查并汇奏各地永远枷号刑犯时,分别是否改悔,以便皇帝亲加省释。

⑤关于乾隆时期的经济变迁所引发的社会秩序紊乱,可从美国学者步德茂先生有关18世纪中国产权纠纷的研究中略窥一斑。参见[美]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及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张世明、刘亚丛、陈兆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⑥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第24—25页。

⑤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二八,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第576页。

⑥《清高宗实录》卷六二〇,乾隆二十五年九月癸丑,第975—976页。

⑦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5页。

⑧官修《台湾纪略》卷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18页。

⑨《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一〇七,第2795页。

⑩花沙纳《德壮果公年谱》卷二,咸丰年间刻本,第53页。

⑪孟森《清史讲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⑫《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一四,乾隆五十七年七月戊戌,第856页。

⑬京畿道监察御史王检《奏为川省奸民勾串西洋夷人传习天主邪教请旨严飭查办事》,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档案号:03-2246-007,一档馆。

⑭杨芳灿等纂《四川通志》卷首十二,嘉庆二十年,京华书局1967年,第35—36页。

⑮《四川总督常明申办西洋人在川传教一案折》,载《清季外交史料》(四),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3—35页。

⑯《清仁宗实录》卷三一八,嘉庆二十一年四月丁卯,第215页。

⑰大理寺卿福申等《呈永远枷号犯人名案由清单》,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档案号:03-2491-003,一档馆。

⑱贵州巡抚文宇《奏为拟将会匪闻绍修、黄云和二犯永远枷号事》,嘉庆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档案号:04-01-01-0566-031,一档馆。

⑲⑳大理寺卿福申等《奏为汇奏在京外省寻常永远枷号人犯数目事》,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档案号:03-2268-012,一档馆。

㉑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22页。

㉒《读例存疑》卷二二,兵律之三,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42。

㉓李圭《鸦片事略》卷上,光绪二十一年海宁州署刻本,第24页。

㉔《为太监涉罪逃跑议罪事》,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索档号:2.1/25 《为太监逃亡查议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索档号:M2.1/68 《为太监逃亡议罪事》,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索档号:M2.1/88。以上见大连满文档案库。

㉕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朝)》卷十三,第171页。

㉖大理寺卿鄂尔瑞等《呈永远枷号常犯长安等摘叙案由清单》,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档案号:03-4001-019,一档馆。

㉗王芷章编《清升平署志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印,第46页。

㉘②⑦光绪朝《大清会典》卷一二二二,内务府。

㉙《东华续录(道光朝)》卷三六,第490页。

㉚沈家本《大清现行新律例》,大清现行刑律案语名例上,清宣统元年排印本,第52—53页。

㉛以上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06—816页。

㉜所谓“若复按拟徒流,不但在配所必不安静,且又潜行逃回,转为地方之害,不若永远枷号”。见《清高宗实录》卷三四二,乾隆十四年六月己卯,第732页。

㉝参见陈兆肆《清代自新所考释——兼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㉞在晚清狱制改良之前,清朝的监狱总体上是相当于“看守所”的功能,原则上是羁押嫌疑犯以待定决(即“久禁者斩绞监候而已”)的设施,而非旨在对已决犯人进行身体管束和时空规训的地点。参见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第97页。

㉟[美]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㊱王先谦《东华录(雍正朝)》卷一七,第2589页。

㊲⑩⑪两江总督百龄等《奏为申明句容县华山寺永远枷号犯僧妄陈时事希冀疏释一案按律定拟事》,嘉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4-01-01-0569-034,一档馆;另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六九,乾隆六十年正月庚子,第610—612页。

㊳大理寺卿福申等《呈永远枷号犯人名案由清单》,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档案号:03-2491-003,一档馆。

㊴关于“就地正法”的最新系统研究,参见张世明《清末就地正法研究》(上、下),载《政法论丛》2012年第1、2期。

㊵《大清十朝圣训》,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赵之恒主编,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6609—6610页。

㊶陕西道监察御史甘家斌《奏请将永远枷号永远监禁各犯年久老疾等情者免其枷号监禁事》,嘉庆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档案号:03-2175-021,一档馆。

㊷《惩罚与规训》,第9页。

㊸《清德宗实录》卷三八八,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丙申,第61页;另见《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2年,第2902页。